

武昌首义前后的刘公

裴高才



刘公



李淑卿

刘公是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被起义者推举为“大都督”。辛亥革命成功后，刘公先后参加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为维护共和贡献了毕生心血。刘公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在武昌首义前后的非凡经历。

共进会的创建者之一

刘公早年就读新学，立志“维新图强，匡正时弊”，于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肄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日本留学生活开阔了刘公的视野，也促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其间，他结识了一批革命志士，和“郅容、章炳麟尤称莫逆”。他曾对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刊极力资助，各翻印数万册，运回国内，用于宣传革命、开启民智。1904年，刘公与宋教仁等合作，出资出版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后又进入日本东斌学堂学习军事，结识了焦达峰等人。1905年秋，刘公在东京见到孙中山、黄兴，协助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并创办《民报》。孙中山见刘公为人仗义，善于结交四方豪杰，更是一见如故。不久，两人互换庚帖，正式缔结金兰。

1906年，焦达峰奉黄兴之命回国参加萍浏沔起义，刘公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积极准备响应。起义失败后，焦达峰遭到清廷通缉，逃亡日本，刘公潜回家乡居3月，又前往汉口“图举大事未成”，于是再赴日本，进入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07年3月，刘公和焦达峰、孙武、张百祥等人在日本组织成立共进会，以图在长江流域中部地区进行革命，并议定以十八星旗为会旗。

1909年初，焦达峰和孙武奉命回国筹划起义，4月，在汉口设立共进会总机关，积极联络聚集湘赣会党进入共进会，为将来起义准备基础，刘公则留在日本，指导日本的共进会工作。1910年秋，刘公毕业后，“携带十八星旗、革命文告和重要书籍回国”，在鄂北、豫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吸收同志入会，鼓励青年参军，并同杨玉如在武汉创办《雄风报》，宣传革命思想。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刘公等人在湖北策划响应。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刘公与孙武等秘密联络，筹划在两湖“共举义事”。

从家人手中为革命“筹措”经费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共进会诸人急切盼望刘公来武汉主持会务，尤其需要刘公在经济上提供支持。刘家虽然富甲一方，可要支出

如此大一笔经费，总得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刘公认为，家中亲戚多和清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说服他们出资赞助革命，绝非易事。于是，他找到从美国返乡的表兄、同盟会会员陶德珉商量，决定趁清明节其叔父刘子麟(任职度支部——清朝掌管财政事务的机构)返乡祭祖的机会，共同在家人面前演一出戏，以便从家人手中取得起义经费。

祭祖当天，刘公和陶德珉对家人称：“捐得一实缺道台，分发河南，可以走上任，急需白银8000两。”得到其叔刘子麟等人的支持。5月，刘公遂携家中所给的5000两银票赴武汉，将这笔钱提供给共进会革命党人作为革命活动经费。不久，刘家又托人捎来4000两纹银。刘公把这些钱全部用于购置枪弹、印制中华银行钞票以及起义旗帜、文告等项，为起义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

布置制作“首义之旗”

1911年春夏之交，刘公在武昌正卫街刚刚购买的公馆里召见了湖北中等工业学堂的3位学生。他们是该学堂电机系的赵师梅、赵学诗堂兄弟俩和机械系的陈磊(即陈潭秋的五哥，字树三，后在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陆军部工作时殉职)，这三位都是共进会会员，比较熟悉绘图并自备有绘图仪器。刘公拿出共进会几位领导人在日本东京研究确定的“九角十八星旗”小图样，向他们布置了秘密放大绘制“首义之旗”的任务。

刘公进一步阐明了该旗图案的意义与尺寸要求，并要求他们必须赶在暑假前后完成20面旗帜的制作。

三位学生立即开始了制作。首先，他们将样旗按要求做成纸型，在送呈刘公得到认可后，再在红、黄、黑色布片上依样放大裁剪。当时制旗所用的只有白布料，于是，刘公便派人到武昌正街药房，购买了藤黄等颜料回到公馆内秘密染色。三位学生在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马上赶到刘家吃晚饭，饭后便开始埋头苦干，直到夜深才回租房房里就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即完成了绘制、放样与剪裁的任务，然后由共进会骨干邓玉麟在武昌正街找妥了一家裁缝店，而且每次都是在该店铺打烊后，才秘

送两面旗的布料去缝制加工，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总共缝制完工了6面(一说为8面)九角十八星旗。

这6面用于起义的旗帜，先后分送到了武昌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机关和汉口宝善里14号的共进会机关存放。而最后送到裁缝店的两面旗的布料因旗杆套未做好，则留在了裁缝店继续缝制。同时，在1911年9月24日上午举行的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大会上，再次重申加快制作起义时统一使用军旗——九角十八星旗。为方便起见，剩下的制旗任务就交由革命党人李白贞完成。

起义前被推举为“大都督”

在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召开的大会上，制定了起义方案，初步决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重大事务由3人共同商处。按照共进会规定，总理即是“起义的大都督”(后因革命形势变化，预定计划未能实现)。

9月24日当日，刘公夫妇以风声紧，移居汉口李白贞照相馆与俄租界宝善里1号，以便于和附近的14号机关部联络。

10月9日下午，刘公与孙武往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部点验党员名册后，孙武试验炸弹，不幸被炸伤。声音惊动了租界巡捕。刘公让人将孙武送往同仁医院医治，本人则隐蔽于汉口汉兴里友人处。俄国巡捕前来搜查，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刘公妻子李淑卿、其弟刘同等人被抓。湖广总督闻此事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就义。

10月10日早晨，刘公同张振武等赶到孙武在共和里的藏身处，紧急约见了部分骨干，决议于当晚发动起义，并派人向工程炮队各营传达了起义时间及“同心协力”的起义口令。李次生立即取出为孙武裹伤的九角十八星旗缠在腰间，立即与邓玉麟一道渡江完成了联络传令任务。

武昌起义的战斗打响后，蔡济民命李次生手举九角十八星旗，走在第二十九标第二营进攻督署队伍前面。督署攻克后，李次生举着旗子由千家街向楚望台进发，准备插上蛇山，因山石坚硬，最后将这面九角十八星旗插上湖北省咨议局门前。

第二天中午，新成立的鄂军都督府第一次会议上，谋略处正式确定把九角十八星旗作为正式开国后的革命军旗。这时开会的首脑们便派邓玉麟等人，立刻赶到武昌正街裁缝店取回了最后缝制完工的两面九角十八星旗，并于当天，一面竖在了武昌江边的汉阳门城楼上，另一面竖在了武昌司门口的蛇山鼓楼上(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6月，经南京临时国民参议院议决，将九角十八星旗中间加一星改为九角十九星，正式定为陆军军旗)。

参与起草《鄂州约法》及率部北伐

武昌首义成功，刘公与张振武、蔡济民等同为领导人。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在咨议局集会上，刘公等组织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刘公出任军政府总监察处总监察。不久，刘公和孙武、居正、汤化龙、陶德珉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制定《鄂州约法》。汉阳失守后，武昌危急，黎元洪擅自出走，刘公以总监察名义主持军政府工作，一面督率军队，竭力防守，并组织奋勇军保卫武昌，一面电请各省派兵援鄂。武昌形势一度稳定后，刘公又通令各机关：凡行政措施、人事安排、经费开支等须得总监察处批准。

为了回应和打击袁世凯要挟南方革命政权的狂妄气焰，南京临时政府决定组织6路大军挥师北伐。黎元洪接到南京临时政府的命令，也下令北伐。刘公立即表示愿领军北伐，被黎元洪委任为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刘公革命资历深，待人宽厚，因此鄂北、豫南的革命党人多愿随行，先后有2000多人参加了他的部队。因革命声威远震和河南人民光复心切，刘公率领的北伐部队很快便分别进至河南唐河和新野等地，刘公也于1912年3月20日统率本部抵达襄阳，收编光复襄阳的张国荃部，并准备继续向北推进。就在此时，刘公接到黎元洪命令，由于南北议和，部队在停战期前不许进击。1912年2月10日，南北双方就清帝退位条件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后，黎元洪又电请袁世凯调刘公到北京任职，被刘公拒绝。后经革命党人赴襄阳劝说，刘公勉强答应，于9月离开襄阳前往北京。(作者为武汉文史工作者)



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分局负责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结合山东历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经验，于1942年10月22日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将主力配置在边沿区，当敌人进行“扫荡”或“蚕食”时，部队选准有利时机，“敌进我进”，“翻”到敌人占领区去，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也就是说：“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在罗荣桓的指挥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成功运用“翻边战术”，于1942年11月在海陵取得反“蚕食”战斗的胜利后，又于1943年1月发起了夺取郟城的战斗。

郟城，位于临沂与新安镇之间，南面靠近陇海路，是日军在鲁南苦心经营的步兵营营地。这里城墙高深，炮楼碉堡林立，是一座完全碉堡化了的城池。由于敌人出兵“扫荡”，此时的郟城仅有1个日军小队和一部分伪军守城。罗荣桓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攻克郟城。为了牵制和迷惑敌人，数千民兵配合八路军少数主力，对大庄据点展开昼夜“围攻”，把日伪主力死死缠在沭河沿岸；命教导二旅派出部分部队监视赣榆、新浦方面的日军，以保障攻城部队后侧的安全，另派一部专门阻击马头镇方面的援敌；同时，指示中共滨海地委、滨海专署、滨海独立军分区动员上万名群众，在公路上连续开展4天破袭战，阻断敌人的交通和通讯。

1月18日夜，教导二旅主力急行军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延安成为边区的首府。陕北地区一直干旱少雨，降雨时间又多集中在夏秋之际，所以常受旱灾侵袭。为抗旱备荒、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特别注重进行水利建设。当时，延安枣园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枣园乡有1000多亩川地，西川河从中流过，但因为河床低，难以灌溉，长期以来，对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障碍。

1939年春，边区政府计划从枣园上游裴庄村附近的西川河引水，浇灌枣园1000多亩川地，工程定名为“裴庄渠”。为修筑这条水渠，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4000元，并指派毕业于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前身)的边区水利专家丁仲文负责勘测设计，指导当地群众修建。

8月，裴庄渠正式动工，中央机关、警备团和当地群众一起，修了一条长达6公里的水渠，把靠天吃饭的川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田，次年4月底裴庄渠全部完工。

1940年6月末，延安附近各县遭山洪冲击，汹涌的山洪直接造成刚刚竣工不久的裴庄渠大坝被冲毁。在边区政府建设厅与当地群众的积极努力下，于同年10月再度动工修复裴庄渠，这次水渠重修，吸取了前次的经验教训，注意把新法修筑的内容与当地的具体条件和民间的历史经验很好结合起来，对水渠进水口等进行了改建。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的裴

克郟城“翻边战术”显威力

佟雪辉

40多公里，隐蔽挺进到郟城移动的马陵山区。19日深夜，攻城部队直扑郟城城下，发起进攻，主攻点选在便于隐蔽接近而又无外壕的城南门。突破南门后，敌人增兵于内层城门，并将成批的手榴弹往下投，并向外壕放毒气弹，八路军进攻受阻。20日夜，教导二旅将主攻点改为守敌戒备较差，射击死角较大，但有深宽壕沟的城东南角，实行重点突破。这时，守敌也重整部署，组织火力，点燃火把，竭力阻止八路军攻城。教导二旅经过激战，终于登上了城墙，并迅速沿城墙向两侧发展。与此同时，北门攻城部队也突破北门。残敌见状，只得退到城中心的县府院内，负隅顽抗。21日天亮后，马头镇和附近各据点的日伪军赶来增援，均被八路军打援部队击溃。

教导二旅各部队将大院团团围住，发起猛攻，200多名伪军和伪政府人员举手投降。此时，只剩1座被日军盘踞的炮楼尚未攻下。教导二旅在竹竿上绑上炸药送上敌人炮楼顶部施行爆破，炮楼内大部日军毙命，余者7人投降。至21日10时，攻城战斗胜利结束。

此次战役，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俘日军7人、伪军及伪政权人员600余人。攻克郟城后，八路军又乘胜打下了郟城周围18处敌人据点，迫使“蚕食”沭河沿岸的敌人全部撤退，郟城周边的抗日根据地由4个区扩大为7个区。

延安有条“幸福渠”

薛永毅

裴庄渠于1941年4月19日告成。

建成后的裴庄渠，拦水坝长70米，深宽均为0.6米，流量为每秒0.65立方米。对原来渗水的地方，还用石灰拌黄土填实，保证滴水不漏。全部工程有碎石坝一座、退水闸一座、跌水五座、斗门一座，再加上渡口等，并利用水利设置了水磨三座，以供将来磨粉等用。裴庄渠自裴庄起，经过杨嘴、磨家湾、枣园、侯家沟，直达杨家崖，全长约6公里，灌溉面积达1500亩。

裴庄渠建成后，边区政府除直接拨款外，还发动附近群众按照每亩地2元价格入股，成立了裴庄渠水利合作社，使得群众从一开始便参与到裴庄渠的日常使用和管理中来。为了提高裴庄渠的利用率，同时用丰收的果实教育群众，自1942年起，边区政府建设厅还派了技术人员，组成裴庄渠水利管理所，亲自经营着枣园30亩农场，为群众提供指导。该渠作为边区延属分区灌溉面积为最大的水渠，据1943年春统计，能放水1072.5亩，每亩以增收细粮三斗计，年可增收细粮321.75石。

裴庄渠的建成使用，不仅让沿线的贫瘠的土地变为肥沃的水田，枣园、裴庄一带的群众也迅速变“靠天吃饭”为旱涝保收，农业生产收入得到了很大提升。群众发自内心的感谢党中央，感谢边区政府，把裴庄渠称为“幸福渠”。“幸福渠”为边区兴修水利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边区各地大小水利工程如雨后春笋，普遍发展起来。

项松茂以身殉国

陶诗秀



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中国新药业先驱项松茂于1911年任上海五洲药房总经理后，将中国新药业发扬光大，1922年，斥巨资收购外商上海中国肥皂厂，改名为上海五洲固本皂药厂，生产多重新药，首创亚林奥药水、东灵药棉、甘油、牛痘苗等国产新药和国产固本肥皂，由于价廉物美，广受消费者欢迎，成为中国西药业办厂自制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先驱。

20世纪20年代，项松茂就开始致力于提倡国货运动，发起组织中华国货维持会，又任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上海救国会委员，响应号召封存店内日货药品，对日实施经济绝交，并率先组织厂内职工编成抗日义勇军一营，自任营长，分发制服，每日工作后领导大家军事操练一小时，以做抗日御侮的准备。五洲药房从总经理到工友，全体捐献一天工资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举措，招致日军的极度仇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前次伤亡很大。项松茂接受政府生产军需药品的任务，亲自监督生产，日夜不停赶制药品，供应前线急需。一天晚上，日军伤兵卡车驶经五洲药房第二分店时，宣称受到枪击。次日上午，

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浪人十数名包围第二分店并砸开店门闯入搜查，将11名留守店员抓走。项松茂得到消息后亲往营救。抵达分店时，发现有日军在门前巡逻。项松茂当即上前交涉，探听被捕店员的消息。在场一人相约“次日在原地会晤”。项松茂回到寓所后召集同事，汇报了情况，并决定第二天依然前往营救被捕工友。大家恐日军有诈，但项松茂处之泰然，更冷静地叮嘱大家“明天照常开工”，多生产军需药品，以供前线急需。

次日下午，项松茂再次前往二分店营救工友。车至中途，街上已成戒严，项松茂推门下车，坚持进入戒严区。项松茂来到二分店后，向日本特务提出要求保释被捕人员，却被日特抓走，押送到江湾敌营。项松茂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当面怒斥日军侵略罪行，于1月31日凛然就义。

项松茂以身殉国后，国民政府以“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著名进步人士史量才、章太炎、黄炎培等都曾撰文，高度评价项松茂崇高的爱国精神。1982年项松茂殉难50周年之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为项松茂写下了“制皂制药重科研，业光华异众贾；抗敌救友尽忠诚，爱国殉身重千古”的题词。

山子头反击战，新四军“擒贼先擒王”

贾晓明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淮北的新四军部队为争取改善国共关系，加强抗日团结，从多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在淮北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2月，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受到日军攻击，溃不成军。在新四军四师的掩护和救济下，韩德勤得到充分休整、元气日渐恢复。就在此时，韩德勤却思将仇报，再次挑起摩擦，率部进占淮北根据地中心区，盘踞在山子头等地，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叫嚣要建立“反共基地”，并企图与东进的国民党军王仲廉部实施“夹击”，一举“吃掉”新四军四师。韩德勤忘恩

负义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无比愤慨。新四军军部在截获了顽军要发动突然的军事进攻的电报后决定，集中新四军四师主力及二师、三师以及淮海军分区等部分部队统一归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指挥，先集中兵力给韩德勤以坚决打击，然后再掉头迎头痛击王仲廉部的进犯。

为给韩德勤最后一次机会，淮海军分区派人劝告韩德勤，希望他遵守和新四军之间的协议，顾全大局，共同抗日。然而韩德勤的气焰愈加嚣张。

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遂于3月17日下午召集九旅、十一旅、七旅、五旅、骑兵团首长参加作战会议。会议决定发起山子头反击战，由九旅旅长韦国清率九旅担任主攻，力求全歼驻扎在山子头地区的韩德勤总部和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主力。而第十一旅三十一、三十二团各1个营及五旅4个连统一归十一旅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赖毅指挥，攻击顽军独立第六旅。鉴于当时，新四军正在各地执行反“扫荡”任务，部

队比较分散，九旅只有二十五、二十六团两个团的兵力，彭雪枫决定师警卫营划归韦国清指挥。

山子头是成子湖西北岸的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土岗子，岗上有孙圩、韩圩、王圩、裴庄等主要村庄。经侦察，韩德勤总部和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分别盘踞在这几个圩子里，共3000余人，还有9000人驻扎在附近，韩德勤的总部设在王圩比较坚固的一座庄院里。为了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韦国清决定实施“擒贼先擒王”的作战方案，即集中两个团的大部兵力，一举歼韩德勤、王光夏驻扎的总部。

17日晚8时，韦国清率部队秘密出发，向山子头方向前进。深夜11时，突然天降大雨，九旅指战员冒雨疾进。为了防止掉队和迷失方向、按时到达攻击位置，指战员采取后面的入扯前面人衣服的做法，一个紧跟一个前进，终于在预定时间赶到指定位置。韩德勤部虽然没有固定哨和游动哨，但做梦也没有想到新四军会冒雨夜袭，全都撤回房内躲雨，

九旅先头部队接近其前沿阵地时，韩德勤部仍未察觉。

18日零时，战斗打响。九旅指战员迅速突破外围防线，以机枪封锁院门，并登上韩总部所在屋顶，向院内扫射。顽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死伤惨重。慌乱中，韩德勤亲自督战，指挥院内顽军拼命顽抗。九旅战士们随即在顽军据守的房顶上扒开几个洞口，向房内扔手榴弹，随着一阵轰轰的响声，顽军纷纷举手投降。王光夏龟缩在房内拒不投降，被九旅战士一枪击毙。到凌晨4时许，山子头地区的顽军悉数被新四军消灭。韩德勤换上士兵军装，躲进俘虏群里，企图蒙混过关，但马上被新四军认了出来，只得乖乖投降。

与此同时，十一旅展开攻击后，与顽军形成了对峙。战斗持续到上午10时，顽军部分部队仍在负隅顽抗。彭雪枫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九旅集中力量，协助十一旅对顽军发起猛攻。不久，新四军各部相继赶到，投入最后的战斗。顽军旅长李仲廉企图突围，被新四军击毙。从攻击开始直到战斗结束，整个山子头战役共计15个小时，韩德勤部顽军尽数被新四军歼灭。已经越过津浦路，进到灵璧以北的顽军王仲廉部，得悉韩德勤被全歼，立即逃回津浦路西。至此，国民党顽固派东西合击新四军的阴谋被彻底粉碎。